

# 坂口禊子小說人物的身分認同 ——以〈鄭一家〉、〈時計草〉為中心

林慧君

長庚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博士研究生

## 中文摘要

坂口禊子（1914～）是日據時期在台的少數女性作家之一，中島利郎認為她是日據時期活躍於殖民地的日本作家中的異數，她能跳脫支配者的視線，以等距離看待台灣人、原住民，創作態度十分客觀純粹，因此獲得了台日讀者的青睞。然而身為殖民宗主國女性，坂口禊子是否確實達到了客觀創作的境地，是否以等距離看待被殖民者，本文藉著坂口在台時期創作的小說〈鄭一家〉、〈時計草〉，以其中人物的認同問題為觀察對象，透過「皇民鍊成」、「通婚」與「混血」主題，探討坂口禊子的寫作視點。坂口禊子的問題意識非常清楚，對於小說中出現的各種人物，也努力作到趨近當事人的立場，探討各種扭曲的現象與內心的矛盾。只是在戰時體制下，為小說中各種人物尋找作為真正「日本人」出口的同時，不論是精神系譜法，或是血統融合法，以乎仍不能或無法跳脫殖民政策下的支配者視野，在觸及問題核心之際，作者只能將希望寄託在「日本寬大的八紘一字精神」，既抽象又難以落實，更忽略了民族文化的差異，使得被殖民者終究無法突破認同的瓶頸。身處殖民地的女性作家，雖然能掌握人物內心細膩的刻劃，或對殖民政策以委婉的態度提出批評，但在戰爭時期發表的作品，要能達到以極客觀純粹的態度創作的境地，仍有個人或大環境的限制存在。

關鍵詞：日據時期在台日人作家 坂口禊子 〈鄭一家〉 〈時計草〉 身分認同

# The Status Identification of Sakaguchi Reiko's Fiction Characters: A Case Study of “Chen Yi Chia” and “Shih Chi Tsau”

Hui-Chiun Lin

Lecturer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ang G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raduate Student, Ph.D Program, Department of Chinese

Tamkang University

## Abstract

Sakaguchi Reiko (1914~) was one of the few female writers in Taiwan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Nakazima Toshio believed that she was the prodigy among the Japanese writers livened up in the colony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She could go beyond the view of dominator and treat the Taiwanese and aborigines in equal. Her creation attitude was totally objective and simple; thus, she was popular with Taiwanese and Japanese readers. However, as a female from the colonist country, did Sakaguchi Reiko actually reach the stage of objective creation and did she treat the colonists equally? Through her fictions “Chen Yi Chia” and “Shih Chi Tsau” created during her stay in Taiwan, this article treats the characters' identification issue as the observation target and explores her writing views from the subjects of “royal citizen establishment”, “mixed marriage” and “mixed blood”. Sakaguchi Reiko's issue consciousness was relatively clear and she made efforts to approach the positions of the characters appeared in the fictions and explored various twisted phenomenon and internal struggle. However, under the system of

wartime, when looking for real “Japanese” outlets from different characters in the fictions, regardless of spirit pedigree method or blood relationship mix method, it seems that the dominator’s vision under colonization policy still cannot be thrown off. While touching the core of the problems, the writer only placed her wish on “Japanese tolerant hakko ichiu spirit” which was abstract and difficult to be carried out. The spirit even neglected the difference of national cultures so that the colonists could not break through the obstacle of identification after all. As the female writer in the colony, although she could grasp the detail descriptions of the characters’ internal aspects or criticize the colonization policies with tactful attitude, there was still the individual or the environmental restriction for reaching the stage of creation in extremely objective and simple attitude in terms of the works published during the wartime.

**KEY WORDS** : Japanese writers in Taiwan Sakaguchi Reiko “Chen Yi Chia”  
“Shih Chi Tsau” Identification

# 坂口禊子小說人物的身分認同

## ——以〈鄭一家〉、〈時計草〉為中心

### 一、前言

坂口禊子是日據時期在台的少數女性作家之一。其小說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與自身家族相關的私小說，如〈滿潮〉、〈曼珠沙華〉；一是以移民台灣的日本農民為題材的小說，如〈黑土〉、〈春秋〉、〈曙光〉；還有以台灣本土人物為刻劃對象的小說，如〈鄭一家〉、〈蕃地〉、〈蕃地の女〉等。其小說中的人物（特別是第二、三類的小說），不論是日本人，或是台灣人，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因著日本帝國的殖民策略，產生了身分認同的問題。

一九一四年出生於日本熊本縣八代的坂口禊子，本姓山本，熊本女子師範畢業後於小學任教。一九三五年渡台，於一九三八年始任教於當時台中州北斗郡的北斗小學，結識了坂口貴敏夫婦。坂口夫人清子過世後，與坂口貴敏結縭，一面當家庭主婦，教授小原流花道，一面從事文學創作活動。最初在《臺灣新聞》磨練文筆，一九四〇年以日本農業移民小說〈黑土〉，獲得台灣廣播局十週年紀念徵文的特選，自此開啟了坂口禊子的創作路途。由於她的作品多帶有寫實色彩，特別是〈鄭一家〉獲得楊逵很高的評價，故有許多作品是發表在以台灣作家為主的刊物《臺灣文學》。<sup>1</sup>

坂口禊子於戰爭末期，曾被疏散到在霧社事件時屬於「親日蕃」的中原蕃社，此經歷成了〈霧社〉、〈蕃地〉、〈蕃婦羅寶的故事〉一系列蕃地作品的創作

<sup>1</sup> 本段參考〈坂口禊子著作年譜（戰前）〉，見中島利郎、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第5卷（東京：綠蔭書房，1998年），以及〈台灣文壇中的日本人〉，收入垂水千惠著，涂翠花譯，《台灣的日本語文學》（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

動機。一九四六年回日本後仍持續創作，中原蕃社的生活經驗，成了她小說的基調，在日本有「蕃地作家」之稱<sup>2</sup>，開創了個人的創作領域。其中〈蕃地〉一作獲得了新潮社第三回文學獎，坂口禔子以〈雑草のように〉（宛如雜草）<sup>3</sup>為題發表感言時表示，自己對寫作的堅持是像雜草般強韌。雜草的強韌雖不能撫平日本殖民的傷痕，但雜草的樸實不虛偽，或許是她的作品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原因吧！

中島利郎對坂口禔子評價極高，認為她是活躍於日據時期的日本作家中的異數，其特異處為：

第一、為在台極罕有的女性作家。第二、身處殖民地，卻無偏見地以極純粹的眼光看待事物，亦即創作時，不論是寫內地人、本島人、「蕃地」人，與自己保持等距離的關連，不是以支配者的視線看待本島人、「蕃地」人。這種視點，並不是她在作品描寫時有意識採用的技巧，而可說是自幼即養成的日常習慣。<sup>4</sup>

（第一に、まず台湾では極めて稀な女作家であること。第二に、植民地台湾の中にあつて、先入主なく極めて純粹に物事を見る眼をもつていたこと。つまり、創作するにあつて、内地人、本島人、「蕃地」人のいずれを取り上げるにしろ、自己との関わりが等間隔であつたことであり、支配民族の眼で本島人や「蕃地」人を見なかつたことである。このような視点は、彼女が作品描写上で意識的に用いた技巧ではなく、幼少の時から培われた日常の習性的なものであつたといえる。）

因此在台短暫的創作活動，她的作品獲得了台日讀者的青睞。然而身為殖民宗主國女性，坂口禔子是否確實達到了客觀創作的境地，是否以等距離看待被殖民者，本文藉著坂口在台時期創作的小說〈鄭一家〉、〈時計草〉，以其中人物的認同問題為觀察對象，探討坂口禔子的寫作視點。

<sup>2</sup> 河原功，〈日本文學中の霧社事件〉，收入氏著，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開展》（台北：全華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頁88。

<sup>3</sup> 《新潮》53卷3期（1956年3月），頁133。

<sup>4</sup> 〈坂口禔子作品解説〉，見中島利郎、河原功前掲書，頁557。

## 二、皇民鍊成

一九三七年中日爆發戰爭，日本於殖民地台灣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包括信仰、語言、服裝等的日本化，例如廢除傳統信仰、改信日本國家神道、敬拜日本天皇、改穿和服、講日語、改日本姓等。一九四一年成立了皇民奉公會，公布實施志願兵制度，通過精神方面的「一視同仁」、「日台同化」，以掩飾經濟上和社會上的不平等，鏟除抵抗力量，籠絡、培養順從的「皇民」。<sup>5</sup>在決戰體制下的台灣文學，所負擔的民族問題，是以「皇民化」此一被扭曲的形態表現的。<sup>6</sup>

坂口禊子一九四一年九月發表於《臺灣時報》的〈鄭一家〉<sup>7</sup>，對率先追從皇民化的小說人物鄭朝有著尖銳的刻劃，對於「國語教育」、「民間信仰矯正」、「改姓名」等皇民化運動內容多所著墨。透過小說中老、中、青三代，對「國語」、「舊習慣」的態度，可以窺見其人物身分認同的處境與主體意識狀態的複雜面向。

小說描述由行進中豪華的鄭朝送葬隊伍開始，從未亡人玉、長子樹虹、媳婦翠霞以及長孫樹一郎在隊伍中的表情神態，反映了敘事者對傳統喪禮的批判，認為長達四十九天的殯殮葬儀，是繁瑣空虛的形式主義表現。只是要改變承繼儒、道、佛等禮俗而來的喪葬習慣，不是從形式上改變即可。小說第一節結尾寫道：

<sup>5</sup> 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將台灣定位為「殖民地」，1919年時的「同化政策」主要為以國語教育為中心的同化教育。後藤新平（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之民政長官）標榜「生物學原則」的殖民政策。認為新領土統治之初，應排斥極端的同化主義，朝漸進主義出發。他設置了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及其他種種研究、調查機關，網羅學者，擬以生物學為基礎，樹立所謂「科學的殖民政策」，也使「同化政策」無緣落實於台灣。1915年林獻堂等人創設的「台灣同化會」遭解散，顯示統治當局對「同化」一事的複雜心態，並具有相當的戒心。1919年日本開始提出「內地延長主義」的施政口號，實際為一「法制上同化」，局限在內地的法規、法制方面，與「文化上同化」、「精神上同化」是有距離的。「同化」在仍以殖民母國本身利益為主要考量的當時，卻是一種禁忌。蔡培火於《給日本本國民書》（1928）批判同化是「愚民化的看板」、「榨取的別名」。1937年起的皇民化運動，為日本欲將台灣「去殖民地化的表徵」，此一「同化政策」是因為戰爭關係，為取得殖民地人民之人力物力支援，不得不推動的。參考蔡錦堂，〈日本治台時期所謂「同化政策」的實像與虛像初探〉，《淡江史學》13（2002年）頁181-192。

<sup>6</sup> 尾崎秀樹，《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台北：人間出版社，2004年），頁181。

<sup>7</sup> 本文所依據的版本為中島利郎、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第5卷所收，原文為日文，中文為作者自譯，以下引文僅標示頁次，不另加註。

隊伍以緩慢的步伐向墓地前進著，彷彿因舊習的重壓顯出疲態……

（行列は、墓地へのろくさい歩みをつづけている。因習の重みに疲れたやうに……頁 12）

依禮慎終是台灣的人生大事之一，殖民政府長期以來大力提倡改變台灣舊風俗習慣，而在皇民化的大義下，以改變喪葬儀式來達成皇民化的任務，仍是一條漫長且充滿困難的道路，正預言了皇民化運動不能成功的現實狀況。

小說從第二節開始，回溯了鄭家三代的演變。鄭朝繼承了父親鄭梧桐以兩岸貿易致富的財力，打破一般人對富豪觀念保守的印象，率先積極響應日本總督府提倡的皇民化運動。他要裹腳的妻子玉學作日本菜，在家力行日式生活，並先後將獨子、長孫送往內地（日本）接受教育，藉以完成其努力成為皇民所不及的夢想。對於獨子娶日本女子為妻，這件足以在母子間掀起風波的事，鄭朝一開始即顯得欣慰不已。而鄭朝半調子的日本化言行，往往成了敘事者嘲弄的對象。例如在日常生活方面，

穿和服。連和式禮服都有，只是有時會將右襟反穿在上。家裡鋪著榻榻米，跪坐著生活。由於並非打小養成的習慣，常常跪坐到腳痛，而日本菜怎麼吃也沒有飽足感。雖然如此，他還是很努力。

（着物を着た。時には右を上前に着てるやうな事もあつたが、式服さへ和服を揃えていた。家の中に畳を敷き、座る生活もやつた。然し、幼い折からの生活が、彼の座りなれない足を痛め、食べなれない料理には満たされなかつた。それでも尚、彼は努力したのである。頁 14）

配合國語普及政策，鄭朝努力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語，小說中描述其「ダ行」和「ラ行」不分的發音，以及台語式日語。學習外語時，發音及語感受母語影響本是無可厚非的，而作者所要嘲諷的是鄭朝的奴性態度，他對來訪的日本高官諂言：

我敢說自己不管在家裡面還是在外面都不講台灣話。我認為皇民化就是要貫徹使用國語。這些本島人幾乎是在公家場合講國語，一進家門就說台語，以大廳作界線，這種我是不贊同的。實際上有人不是那樣的。

（私は、台湾語を内れも外れも使はないのを誇りとしてをります。皇民化は、国語を徹底させる事につきると思ひます。こいつらの本島人は、殆ろ官廳れは、国語をつかつてをりますが、これれ一步家に入ると、もう台湾語れ話します。正廳の扉が、その境界になるのれす。こんなのは、感心しません。實際。或はさうれない人もあるれせうが。頁 16)

鄭朝自以為是的優越感，以及身為 E 鎮鎮長的使命感，在斥責晚宴上台語交談的妓女時，脫口而出的卻是「汝講國語好啦！」招來日台賓客哄堂大笑。語言的錯亂現象，顯現鄭朝認同上的混淆，他雖然缺乏自覺性，甚至顯得一意孤行，例如對於妻子江玉的不學國語、不接觸內地人，是他努力皇民化中最感挫折的地方，但也存在著他在語言同化過程中的矛盾。當鄭朝不得不以台語和妻子交談的時候，他的內心卻泛起了遊子返鄉般的安定感，

跟玉以台語交談時，是否有損於以內地化生活態度或語言自豪的他，因而感到厭惡呢？並沒有，反倒是令他有休適放鬆的感覺。彷彿是異鄉人終於返抵家鄉的安適，讓他久繃的肩頭放鬆，表情顯得放心。

（玉に對して、台湾語で話しかける時、彼の内地化したと信じている自分の生活態度や言語への誇りを、傷つけられるいまいましきを感じるかと言ふと、さうではなかつた。むしろ和やかな休息を感じるのである。ホツとするのである。故郷へたどりついたエトランゼーの気安さを感じ、彼が常に肩をはつているポーズがくづれ、安堵の表情になるのである。頁 15)

以此相較於對台灣「同化」教育政策有決定性影響的上田萬年的語言觀，上田標榜日語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國體的標識」、「情深無比的母親」<sup>8</sup>，國語（日語）是日本「鎔化」異民族為日本人、統一其體內「精神血液」的手段，然而積極響應皇民化政策的鄭朝，母語（台灣話）卻是潛藏在其內心的溫暖襁褓。

<sup>8</sup> 上田萬年，〈国語と国家と〉，《明治文學全集》44（東京：筑摩書房，1968年），頁 108-113。參考陳培豐，〈重新解析殖名地臺灣的國語「同化」教育政策——以日本的近代思想史為座標〉，《臺灣史研究》第 7 卷第 2 期（2001 年 6 月），頁 26-27。



貫徹實踐皇民鍊成的鄭朝，臨終前堅持依內地方式送終，採火葬並立即行告別式，以傳統葬禮所需停棺費用的三分之一辦理。而其他的三分之一作為國防捐獻，另外的三分之一救濟公益，在形式上表現他生不能為日本人，死要為日本鬼的決心。鄭朝至死仍未能自覺他在身分認同中所產生的扞格，這也許是坂口禔子對皇民同化政策失敗所提出的疑問。而在日本軍國意識強力的支配下，作為在台日人作家觀察出被殖民者扭曲自我而產生的不協調言行，這或許是自謙為「家庭人」<sup>9</sup>的坂口禔子所獨擅而被視為異數的所在。

身為積極皇民化的鄭朝的妻子——江玉，是個與鄭朝完全相反的傳統派，她不愛說日語，纏足、堅持傳統葬禮與舊習俗，她奉行傳統民間信仰，認真地向孫子們講述土地公的由來。女性在日據時代小說作品中，經常成為台灣的隱喻，江玉便象徵著台灣的自主性，成為鄭家由鄭朝起始的皇民鍊成過程中的阻石。在她足不出戶的封閉環境中，以對傳統習俗的執拗來固守她在鄭家的地位。然而在殖民統治下，玉仍不能自外於文化衝突的現實世界，作為鎮長之妻，即使刻意與外界隔絕，因職務所需，來台的日本人家眷禮貌性地拜訪鄭家，即讓玉產生了排日情結，

玉認識很多來訪的內地婦女們。身為E鎮大富豪兼鎮長，每當調職遷移時，她要和她們作禮貌上的交際。那些人剛開始面對玉時，還保有因懾於建築物的豪華所產生的表情，告辭時有意無意瞥見玉的小腳時，嘴角隨之泛起冷笑。便禮貌性地點頭離去。玉每每感到屈辱，幾乎流下眼淚。（玉は鄭家を訪れた澤山の内地人の婦人連を知っている。E街一の富豪であり、街長である鄭家に敬意を表して、轉勤の移動の度に、彼女は挨拶を受けた。その人々は、初め、豪壯な建物に押されているやうな表情で、玉に向つたが、歸る時には、チラと玉の纏足した足を見たやうな見ないやうな素早さで見やり、ふと冷笑を口邊にのぼらせた。そしてお辞儀だけは丁寧にして出ていった。玉は、その度に屈辱を感じ、危く涙をこぼさうとした。頁20-21）

<sup>9</sup> 坂口禔子，〈雜草のように〉，頁133。

因此，當玉得知獨子樹虹娶內地女子小夜為妻時，幾近歇斯底里地反對，她指責丈夫鄭朝說：

你學日本人那套我都沒反對，但要獨子娶內地人作妻子，會不會太過頭了。不需要到那樣的地步。

（貴方が、内地人の真似をなさる事には、私は反対しませんでした。でも、内地人を一人息子の嫁にしようと言ふのは、少し行きすぎやしませんか。其處迄する必要はないと思ひます。頁20）

娶個語言不通的媳婦，不僅生活上無法溝通，加上「內地人的優越感」，玉在鄭家固守的地位深受威脅，對日本人的反感成為她為反對而反對的動力。玉本有意包辦獨子的終身大事，且屬意林家女兒芳壽，但當林母風聞樹虹娶了內地人為妻的消息後，一副興師問罪的態度，惹得玉反唇相譏，而一反先前反對的態度。見了小夜本人後，玉發現她是個寡言安靜的女子，合乎其心中理想的媳婦形象，馬上轉怒為喜。小夜為鄭家育有一男三女，在長子樹一郎的印象中，總是靜靜地閉居家中，不論在什麼地方都顯得孤寂。由無聲的媳婦、足不出戶的婆婆構成的封閉世界，在雙重壓抑與封鎖的空間下，暫時躲避了皇民化運動所颳起的風暴。

當鄭朝胃癌已病入膏肓，面對任職總督府的獨子樹虹北上就醫的堅持，玉則堅持傳統信仰，以「有應公」、「媽祖」的有求必應加以阻撓，揭開了現代與傳統對峙的序幕。對鄭朝行內地化喪禮的遺願，玉千方百計透過道士、鄉人的集體輿論力量迫使樹虹屈服，改採行台灣式傳統喪禮。皇民化運動似乎干擾不了玉的認同執著，只是將掙扎轉給受日式教育、娶日本人為妻的獨子樹虹。樹虹本以為自己內心並無所謂「本島人」或「內地人」的區別，所以能和日本妻子小夜結婚。然而面對意義複雜而重大的喪禮，父親和母親不同的觀念取向，著實令樹虹陷入矛盾，

對母親堅持舊習俗，越來越不認為那是無可奈何，反而漸漸感到悲哀。比起已逝的父親，如果自己的心向活著的母親，對父親會不會顯得不孝？

但就此妥協的話，身為 E 鎮皇民化先驅父親的名聲要怎麼辦？自己對內地人的感情又將如何是好？對大多數的本島民眾的心理當然要有所交代，但也不能不顧及那些少數卻有勢力的內地人的想法。

（母は舊習に執着している。そしてそれを仕方がないと言ふ投げやりな考えへ方でなく、哀れだと思ふ心の傾き方になつてゆくのである。死んだ父より、生きている母への自分の心のつかひ方は、父へ親不孝な息子になるであらうか。然し、自分が妥協したら、E 街の皇民化運動の先覺者としての生の父前の名どうなる。又、自分對内地人の感情はどうなる。多數の本島人民衆の心をつかむ事も必要には違ひない。然し、小數の勢力家である内地人の心を放してはならぬ。頁 42）

在治喪的傳統樂聲中，樹虹流下了哀傷的淚水，體悟出父親生前所執著的皇民化言行，只是形式的模仿，精神層面尚未完成，故父親遺言所交代「全部內地式」的意思，應是重在對事情的看法與態度，而不須拘泥於形式。治喪期間鄉親遊說不絕，他們認為鄭家如果輕率地選擇內地式的喪禮，反而會讓 E 鎮鎮民認為是為了炫耀。視鄭家為本島人的民眾，期待看到鄭朝莊重豪華的台灣傳統喪禮，那是對動輒皇民化、簡單化行徑的挑戰，也可藉此向輕蔑台灣傳統的人示威。加上母親對台灣式喪禮的堅執，自以為沒有「本島人」或「內地人」之別的樹虹，此時卻遙想起已逝的日本妻子小夜在鄭家所遭遇的處境，而現在只有獨自苦思一條合乎內地人與本島人期望的出路。結果只好承認一切是由於自己太執著形式，以至於未能掌握「皇民化」的精神。在法事樂音與孝女哭聲中，樹虹思及母親為此事傷心的疲弱模樣，決定順從眾意，為父親辦理台灣式的喪禮，而保留日本式的墳墓。只是如此妥協的意識，在面對自內地回來奔喪的長子樹一郎時，卻為自己無法擔負起脫去舊慣的重擔，感到愧疚地自承為敗戰者，在與樹一郎的談話中，樹虹對父親未能趕上改姓名一事，又表現出遺憾的態度。

面對鄭朝皇民化過程中所留下的矛盾衝突，樹虹既自縛於形式，又自我解套說：

已不是偏狹行事的時代了，這樣說來，爸爸對祖父的喪禮老想要採內地式，或是不採台灣式之類的想法，也許顯得格外無意義。如果以擁有三千年歷史的日本整體來看，從北端到南端，風俗習慣也不全相同，所以台灣有台灣的風俗習慣也是可以的吧。而且在日本化的過程中，有寬大的八紘一字精神在。

(もう狭い量見で行動する時代ぢやないんだ。さう言ふ意味から言へば、お父さんが、お祖父さんの葬式を内地式にしようとか、臺灣式ではいかんとかと考へたのも、これは案外つまらないことかもしれないな。三千年の歴史を持つている日本全體を考へてみても、北の端から南の端迄、同じ風習を持つているんぢやないんだから、臺灣は臺灣の風習を持つていてもいいんぢやないかな。又、それを日本化してゆくとところに、寛大な八紘一字の精神があると思ふんだ。頁 56)

「八紘一字」本是「天下一家」的意思，是由《日本書紀》「神武天皇」卷的「掩八紘而為宇」一句，從明治年間始慢慢演化成的用語，代表著「皇道天業」的精神與目標。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在大東亞共榮圈的企圖下、「與全人類共存共榮」的想像下，「八紘一字」成了日本民族的世界觀，即相信全人類必定走向世界一家，而日本天皇是全世界唯一能實現此一「天業」的聖賢。「八紘一字」成了日本正當化侵略占領各國行為的口號，所有日本人都要翼贊天皇此一願業。<sup>10</sup>

在「天下一家」的國體象徵下推行的皇民化運動，如果是不拘於表面形式的，是可以包容異族文化的，那便成了廣義的文化融合，然而這是不符殖民地支配的政治事實。樹虹面對皇民化的矛盾衝突時，只能以想像的殖民母國自我解套，而鄭家三代之間所產生的種種矛盾衝突，實為殖民政策所造成的困境。

<sup>10</sup> 關於「八紘一字」的定義可參考里見岸雄著，《八紘一字——東亞新秩序と日本國體》(東京：錦正社，1940年)，頁 123-131。

### 三、通婚與混血

日台通婚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經常出現在坂口禔子的小說。在〈鄭一家〉中，對皇民化家庭的子女，特別是第三代的認同情形，作了比較理想化的安排。〈曙光〉、〈時計草〉<sup>11</sup>，則對於「血統」問題有不同層次的討論。

〈鄭一家〉登場的第三代以球子和樹一郎為主，他們是台籍父親樹虹和日籍母親小夜的子女。球子繼承母親小夜的美貌，似乎毫無疑問地認同母親所來自的內地，而其身分認同的意識，明顯地表現在對年輕貌美繼母翠霞的嫉恨上。本島出身的周翠霞和樹虹相差二十歲，是第一任妻子小夜去世五年後續弦的。她的加入，喚起了球子體內流有本島人血液的意識。球子對繼母買給她的學校洋裁用布料，借題發揮說：

媽媽總是選中國風的，(畢竟還是很難啟齒說是本島人的癖好)。我在朋友面前很難為情。

(お母さんの、いつも支那趣味ですもの。(本島人好みとは流石には言はなかつた)。私、お友達に氣まりが悪いわ。頁35)

依談話內容背景看來，球子求學的環境可能是專為日本人與台灣上層社會子弟設的學校，在日本人的同儕面前，中國風的布料透露了球子體內本島人血液的事實，球子毫不掩飾的鄙夷態度，顯現出殖民者文化權凌駕被殖民者，並隱含了文明與落後的價值判斷。面對眾人決定以本島式的喪禮為祖父送終的事，球子有些洩氣地對剛從內地回來的哥哥樹一郎說：

沒辦法啊！我們只不過是鄭家的一員而已。……

我最近很討厭繼母。一看到那個人，就想到自己的血和她是沒有交集，還有父親的血、母親的血。

(仕方がないぢやないの。私達もやつぱり鄭一家の者でしかないんだ

<sup>11</sup> 〈時計草〉最初刊登在《臺灣文學》第2卷第1號(1942年2月)時，被刪去46頁，只剩第一頁11行、最後一頁7行。本文所依據的是改稿後的文本，使用版本為中島利郎、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第5卷所收。原文為日文，中文為作者自譯，以下引文僅標示頁次，不另加註。

わ。……

私、この頃、お繼母様が憎くらしくなつたことよ。あの人を見てると、私、自分の血が平行して流れているやうな気がするの。お父様の血と、お母様の血と。(頁 49)

日籍生母的離世、台籍後母的繼室，讓球子在身分認同上產生煩惱。涉世未深的她似乎不能對台籍血緣所自的父親發洩什麼，同是女性卻毫無血緣關係的翠霞，以作為台灣人、繼母的原罪，成為球子皇民身分認同困擾的代罪羔羊。

相較於球子，身為鄭家長孫的樹一郎，中學以後便在日本求學，對繼母翠霞的印象多來自書信文字。樹一郎認為繼母翠霞不因循舊習、隨時接受新事物，雖然和自己流著不同的血，卻合乎自己心中的現代女性形象。在與繼母共賞曇花的夜晚，為身著台灣服的翠霞的年輕美麗所吸引，內心產生了情慾與人倫的掙扎，在月光下短暫一現的曇花，讓樹一郎毫不遲疑地說出「中國美人」的比喻，藉著對曇花的贊歎，暗示其對異國母親的戀慕，

這是中國美人，不是日本女人。……

是一種命定的美。

(これは支那美人ですね。日本の女ぢやない。……)

宿命的な美だと言ふんですよ。(頁 52)

沒有血緣的關係混亂了其親子身分的認同，最後只得以唯美主義論調為自己的失態尋找出路。

從日本剛回台奔喪的樹一郎，面對因祖父的喪禮不能依行內地式而沮喪的妹妹球子，仍自信滿滿地認為自己和鄭家人是不同的。然而見了在喪禮形式爭議中妥協的父親，樹一郎頓時失去了施力的方向，只能對著父親無法完成祖父遺願的「必然性」空揮拳了。對於積極皇民化如祖父者，到了父親這一代也仍維持本島人作風，仍不能為鄭家帶來新的出發。即使比起鄭家其他人，樹一郎擁有二分之一的日本人血液，但父親對舊慣的妥協，衝擊著樹一郎本不曾懷疑的皇民身分認同。而這回他不但確定祖父是本島人，對自己一向信以為是皇民

而不疑有他的父親，也認為仍不過是個本島人。樹一郎不能指責父親本人，只能怨怒禁錮在父親血液中的舊習俗，以及無所不在的傳統。相對於父親能超越形式的拘執，披麻帶索、真情流露地走在送葬行伍中，樹一郎在行伍中則顯得垂頭喪氣。

長年在內地求學的樹一郎，從東京回到台灣，面臨的不單只是所處位置的移動，更要面對如何填補內地與本島間文化、生活習慣的差異。愛著祖母也愛著父親的親情，並無法阻擋樹一郎對家中盤踞著的本島人氣息的憎惡，喪禮結束後便急著逃回東京。在小說結尾，父子兩人藉本島醫師許茂仁的話穿針引線，以日本「寬大的八紘一字精神」，解決父子因舊習俗引發的尷尬情形。樹一郎若有所悟地說：

日本人是什麼都能馬上吸收並且加以日本化的種族。不論是中國文化或歐洲文明，都把它視為自己的一部分吞下肚，卻一臉泰若而毫無異樣。這不是厚顏無恥，而是一種大器。採納別處事物的所有養分，卻能保有本身絲毫不受影響的純粹性，好厲害的種族！好堅強的精神！對我們來說，真是充滿希望！而我也正是其中的一分子啊！

（日本人つて、何もかもすぐ消化して日本化してしまへる人種なんですよ。支那の文化も歐州の文明も、自分等のものにしてしまつて、まるで呑みこんでしまつた自分の腹の中に、そんな異物はないよ、と言ふやうな顔をしている。これは圖太いのでなくて、大きいんですね。他處の物は、すべて養分として取入れるだけであつて、自分自身は少しも變らない純粹なものを保つてゆける、恐ろしい人種ですよ。たくましい精神力ですよ。僕等にしてみれば、頼もしい限りですね。そして、僕なんかもその一人なんですからね。頁 57)

正如他的父親樹虹以「八紘一字」的精神，解決皇民化過程中新舊習俗所產生的矛盾和困擾，對鄭家的未來充滿使命感的樹一郎，也以呼應「八紘一字」的召喚，模糊自身的認同問題，以回復其完整的皇民身分歸屬。

在這看似「內台一如」的美好願景下，翠霞的生存和存在的正當性則遭到擠壓。面對球子的文化挑釁、樹一郎的異性讚美，翠霞感受到自身命運的乖舛，

結婚快5年了，一個孩子也沒有。翠霞良心上倒覺得那是一種幸福。以翠霞的聰明可以推想，如果自己有孩子的話，一切行動自然會以保有孩子和自己的地位為重，會對鄭家每個人加以刺探，她討厭那種有如陷入泥沼中的自己。因此她已作好心理準備，萬一樹虹死了，她就離開鄭家，一個人過活。那是躲避對球子眼光的恐懼、正面衝突的不愉快的保身方法。

（彼女は、五年になるが、一人の子供もない。それを、むしろ幸せとしている翠霞の気持は、割合良心的であつた。自分に子供が出来たら、自分の行動が、子供と自分の位置を守る本能的なものになり、鄭家の人々へ爪をかける動き方をするであらうと、翠霞の聰明さが豫感する。それは、泥沼の中へ自分を陥れるやうな嫌悪感である。樹虹が死ねば、彼女は、鄭家を離れて一人の生活を初めやうと覚悟している。それには、球子の激しい目を恐れ、正面から衝突する不愉快さから、身をかはさうとする翠霞の保身的な考へ方でもある。頁55）

為了保持鄭一家表面的和諧，翠霞放棄了女性的生產權利。因為一個擁有純粹台灣人血統的第三代，將會使第三代的「皇民」產生「血統不純」的危機，使鄭一家邁向皇民的過程，偏離種族漸趨純潔的道路。翠霞以自我犧牲企圖消除家中本島與內地對立的衝突，而打算在夫死後離家的決定，無疑是自覺於夫死須從子的命運，而那不僅是當時身為女性從屬於男性的宿命，也隱喻了台灣人在殖民統治下從屬於異族的地位。這一以抹殺母性認同來成全橫跨三代的皇民認同問題，看似出自翠霞聰明而自願的選擇，實際上是遭邊緣化後的翠霞所構築的倖存空間，呈現了女性生存空間的雙重禁錮。純粹台灣血統的第三代的「不在」，顯示出支配者純血性思想的排他性。

坂口櫻子對於內台通婚混血的問題，在其描述日本農業移民台灣的小說〈曙光〉<sup>12</sup>中，從戰地歸來的農夫修和內地女校出身的品子有一段相關的對話：

<sup>12</sup> 〈曙光〉最初刊登在《臺灣文學》第3卷第3號（1943年7月），本文所依據的版本為



「我對優生學不是很清楚……不得不顧及解救劣性的事。……我認為為了解救劣性，與優性結合能接近半優性的可能性，必須深入研究相關的結婚指南。對自己的婚姻我抱著非常慎重的態度。」

……為解救劣性而與優性結合，那不就是優性的墮落嗎？……對祖先是種冒瀆吧？對出生的孩子流有劣性血液之事也難以忍受。

「我到底還是個無法跳脫自私想法的人啊！」

（「私は優性学と言ふ事に就ては、充分知らないのですが、……劣性の救済と言ふ事も考へねば、ならんと思ふです……私は、優性と結合すれば、半優性に近付く可能性のある劣性を救ふ為に、結婚指導と言ふ事は、もっと深く研究されねばならぬと思ひますね。私は、自分の結婚には、充分慎重なつもりです。」

……劣性を救ふ為に優性が結びつくと言ふ事は、優性の墮落ではないかと疑はれるからである。……先祖への冒瀆のやうな気がした。又、産れ出る者へ、劣性の血を持たす事も忍びなかった。

「私は、まだ自己主義の殻から脱けられないのだらうか。」頁 134)

在〈曙光〉中，當事人將「優生學」與「混血」的觀念混為一談，對人種改造與種族融合產生質疑，故品子認為為解救劣性而通婚混血，必須付出犧牲自我幸福的代價。二人談話的內容較傾向日本人的婚姻指南，但其模糊不定的言論，也反映了日本在「內台融合」、「理蕃」政策中，獎勵推行內台通婚的目的，企圖以異民族支配者的「優性」血液來抹滅被支配民族。<sup>13</sup>

〈時計草〉<sup>14</sup>則觸及了理蕃政策下所衍生的通婚混血問題，文本對「血液」的問題多所著墨，反映出「血液」有優生學與文化象徵的雙面意義。主角山川

中島利郎、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第5卷所收，原文為日文，中文為作者自譯，以下引文僅標示頁次，不另加註。

<sup>13</sup> 參考星名宏修，〈「血液」の政治学——台湾「皇民化期文学」を読む〉，《日本東洋文化論集》7（2001年3月），頁17。

<sup>14</sup> 〈時計草〉最早發表於1942年2月的《臺灣文學》第2卷第1號，內容因批評殖民政策而遭刪削去46頁，只刊首尾2頁。1943年出版的作品集《鄭一家》收錄同名作品〈時計草〉，內容可能已不同於1942年發表之作。參考中島利郎，〈坂口れい子作品解説〉，收入《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第5卷，頁561-562。垂水千惠，〈台灣文壇中的日本人〉，收入《台灣的日本語文學》頁122-132。

純，是山川玄太郎在台身為理蕃政策指導員時，與原住民女性結婚生下的混血兒，有著比山上原住民高卻柔弱的體格。混血兒取名為「純」，也許是寄託著玄太郎當年政策配合的理蕃理想，即讓「日本人」、「文化人」的血液，在「無文化」的原住民所在的山中培育長成，為民族的自我經營奠定基礎。

然而諷刺的是，純的兩次婚姻皆告失敗，原因顯然是由於母親原住民的身分。被稱為高砂族的原住民，當時的日本人視為「都是些什麼也不懂，令人吃驚的事也毫不在乎地完成的」(何もわからぬ、恐ろしい事も平気でやつてのける者ばかり。頁 195) 蕃人、生蕃。純第一次娶的內地女子，新婚一個月後一回到山上，拋下狠話就回日本去了。第二次婚姻的對象仍是內地女子，純在新婚之夜一告知對方自己母親的身分，對方立刻翻臉痛批山川父子詐欺，當晚即返回娘家了。兩次與內地女子失敗的婚姻經驗，使得純在面對父親努力替他安排的第三位日本女性時，顯得更加躊躇不安。母親原住民的身分是純看待自己婚姻不幸的主要原因，母子間彷彿連繫著一條悲劇命定的繩索，然而追根究柢，則歸咎於父親為何當年要娶山裡的女人為妻，使得身為指導者的純始終解不開認同與歸屬的煩惱。

面對母親三十年了仍顯得笨拙的坐姿，純有種急欲脫離血緣關係的衝動。母親謙遜的用語、卑屈的態度，有時令純感到氣憤，內心質疑母親當年為何要嫁給內地人的父親，然而在實際言行上又努力做到不傷害母親。當純八歲時，父親未清楚交代，即將母親與兄妹三人留在山上返回日本。之後又娶了內地女性為妻，並育有三女，這些都加深了純在身分認同上的陰影與矛盾。在身分認同的曖昧中，只有面對大自然的山林，純才能感受到身心安頓，熱愛原住民與生長土地的純，厭惡來到山裡的旅客那滿足慾望的獵奇式眼光，內心吶喊著「高砂族，我的骨肉至親」。

為了第三次婚姻而到內地拜訪父親時，純忍不住問父親：「您喜歡過母親吧？」面對正為終身大事而煩惱焦慮的純，加上拋棄他們母子三人的愧疚感，經過了深思熟慮的玄太郎，肯定地的回覆純，

我是愛過你母親的，你那高砂族的母親，我把她當一個女人愛著。

（父は、母を愛していたのだ。高砂族である母を、女として愛していたのだ。頁 180）

對自己「遺棄」的行為，玄太郎解釋是為了繼承亡兄的事業而不得不回日本。考慮到原住民身分的妻子，在內地必然會遭受侮蔑，即使有自己的愛作為支柱，不同的風俗習慣，必不能使妻子感到安適，因此忍痛拋下妻子返回內地。至此我們看到，通婚、混血所面臨的不只是人種改造的問題，有更大的部分是社會性的差異。玄太郎對自己的處置有以下的說法，

我想你母親的幸福就是留在山裡，把將成為指導人的你們兄妹養大，在自己的故鄉過完一生，是最合適的幸福。

（お母さんの幸せは、山で山の人をやがては指導するお前達二人を育てて、自分の故郷で、一生を終へる事が、一番ふさわしい幸福であらうと思つたんだ。頁 189）

玄太郎美好的想像在面臨純接連失敗的婚姻時，也不得不深思當初理想化的想法所造成的後果，而自我批判著：

我一個人播下的種子，卻萌生了不幸。

（私一人の蒔いた種子。不運な芽だつた。頁 190）

困於混血而散發著迷惘哀愁的純，聽完父親一席話之後，更感空虛寂寞，身為文化指導者身分的父親，似乎也無法替純指引出一條明確的道路。

從小就愛著山的純，因著「阿蘇」<sup>15</sup>火山生命力的鼓動，在「草千里」激烈地狂奔、撲跌，躺在日本的土地上，腦海中浮現出家鄉族人清晰的臉龐，醒悟到自己體內的「高砂族血統」，必須要肩負起民族新發展的責任。身為山中之子的純，從「阿蘇」火山的轟鳴中，獲得了精神上的救贖，堅信民族的血必須

<sup>15</sup> 「阿蘇山」為五座山組成的複式火山，其中「中岳」為一活火山。綿延在「烏帽子岳」與「杵島岳」間直徑約一公里的大草原，即「草千里」。皆為日本九州著名觀光景點。參考《日本語大辭典》（東京：講談社，1989年），頁 41。

是「純潔」的。對於來自父親的內地人血液，只有督促自己進一步放下作為局外人指導者的身分，返鄉與山中女子結婚，將自己的「血」融入高砂族中，才是新民族的開始。這是對母系的認同，使自己成為真正的山的子民，才能完成父親留下的理蕃理想。「血液」是純認同困擾的根源，也是他找尋歸屬的線索。

純看到自己第一次來內地看父親時從家鄉帶來的時鐘草，如今已在父親的院子裡生根茁壯、開花結果，

異鄉的時鐘草啊！好好吸取這片土地的土質，盡情地蔓延。讓自己的生命在天地間盡其可能的伸展吧！

在山中落下的一滴血，也正在高砂族當中成長著。

（異郷の時計草よ、この土地の地味を腹一ぱい吸ひこんで、想ひきりはびこるがよい。そして、自分の生命を、天地の間に伸ばせるだけ延ばしてみるがよい。

山に落ちた一滴の血も亦、高砂族の中で育つていかう。頁 209)

「時計草」(時鐘草)之名，因其花盛開形狀有如鐘面而得名，中文譯為西番蓮，即百香果，台語亦有稱時計果或時鐘果的。英文則取其花型結構有如耶穌基督受難情狀，名之為 Passion Flower。以「時計草」為小說名，是否暗喻著通婚混血的同化政策中，須帶著一種自我犧牲的激情、受難的情操呢？來自山川純出生地台灣故鄉的時鐘草，在日本的土地自在生長；而體內流著內地人父親血液的純，在在地化場域「落地生根」，這或許是民族融合的理想出路吧。然而民族融合畢竟不只是生物學層面的問題，還牽涉到社會、政治等複雜層面。山川純所經歷的認同和歸屬的困境，有很大層面是來自一個具有種族文化優越感的統治民族，對於混血者的精神純度與愛國心仍帶著懷疑的態度，始終無法真正做到一視同仁。

玄太郎為純所安排的第三次結婚對象錦子，是位帶有「八紘一宇」精神的女性奉公主義者。她欣賞「能樂」(史上最悠久的日本傳統戲劇)，計劃以教導山中女子花道來傳遞大和精神。對於民族政策，錦子認為站在民族指導者的立場，那種帶有排他性、獨善性情緒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日本必須拿出真心誠意，

以無限的融合力做到清濁兼收，才能更加壯大。故必須將高砂族視為一個一個的日本人，全心全意地加以培育。

錦子選擇與純結婚，是基於對純人品的信賴。但對民族仍持有純血觀念的錦子，會選擇通婚混血，完全是呼應國家殖民政策的需要，在戰時全民動員體制下，表現其為皇國盡忠犧牲的美德。同時高砂義勇隊在南方叢林戰的英勇事蹟，使得內地日本人一改對原住民的歧視態度，高砂族即使生不能以純粹的血統作個日本人，卻能因高度求生技術、勇敢善戰而作為日本人而死的皇民事蹟，掃除了錦子內心的猶豫，更加堅定自己的選擇。當純為了融入土地的理想，決定選擇家鄉女子為再婚對象時，錦子理直氣壯地說：

您所說的前進，並不是只有加深和高砂族的血緣這一條路可走。讓高砂文化接近日本傳統獲得提昇，不也是一種前進嗎？我一定能幫上忙的，請讓我隨侍在您身邊吧！

（貴方の前進なさる事は、高砂族の方と血縁を深めるだけが道ではございけません。高砂族の文化を、日本の伝統に少しでも近寄せ高めめるのも前進ではないでせうか。私は、きつとお役に立ちます。御一緒にお伴さして下さいませ。頁 218）

來自文明與傳統並存國度的錦子，相信愛情與女人的決心可以解決一切。相對於純的自我認同旅程，錦子的言談充滿著國族主義論述的語調，舉止是充滿犧牲奉獻的熱情。雖然兩人都選擇了「混血」，但純的決定是以加深原住民的血液，而錦子則是加深日本人的血統，並傾向以文化統馭為前進理論。

最後純折服於錦子的滔滔雄辯，內心彷彿受到洗滌淨化。當兩人決定共同攜手為高砂族的民族政策努力時，純彷彿聽到耳邊響起了幾萬個強有力的步伐，正邁向戰場，準備效忠天皇，這一幕令人聯想到的是大東亞戰爭對高砂義勇隊的召喚，似乎暗示著純這一連串的自覺與認同的追尋過程，終究跳脫不出殖民支配者的政策框架。

在戰爭體制下，女性往往扮演著配合從屬於男性的角色。但錦子與純正好與此逆向，是一個不完整的、缺乏自主性的混血男性，與代表殖民者的剛強女

性，二者間勢力不均衡的對話，顯示著純無法改變自己作為被支配者的命運，身為殖民國女性的錦子，不僅代表著文明，也成了聖女的化身。面對通婚的問題，日本人娶台灣女子，和台灣人娶日本女子，便有不同的發展。如同父親玄太郎認為原住民的妻子無法到內地來生活，而作為純的內地人妻子卻不將生活習慣視為問題，突顯出同化政策下所存在的差別待遇與文化霸權。

#### 四、結論

坂口禊子小說人物面臨的認同問題，大致分成三個方向發展，其一是傾向精神系譜的皇民，如鄭朝父子；其二是決定於血統純正與否的皇民，如山川玄太郎父子；還有堅持保有傳統的少數，如鄭妻江玉。坂口禊子的問題意識非常清楚，對於小說中出現的各種人物，也努力作到趨近當事人的立場，探討各種扭曲的現象與內心的矛盾。只是在戰時體制下，敘事者為小說中各種人物尋找作為真正「日本人」出口的同時，不論是精神系譜法，或是血統融合法，以乎仍不能或無法跳脫殖民政策下的支配者視野。不論是〈鄭一家〉或〈時計草〉，認同的困境並未能得到具體而令人信服的解決，在觸及問題核心之際，敘述者只能將希望寄託在「日本寬大的八紘一字精神」，此一召喚日本人翼贊皇道天業的信念，既抽象又難以落實，更忽略了民族文化的差異，使得被殖民者終究無法突破認同的瓶頸。

戰後坂口禊子回顧戰爭期間作品〈時計草〉遭當局刪削的理由時說道：

原因是批判了殖民政策。之後更嚴格檢閱我的作品，將我貼上了不協助戰爭的標籤。

（植民地政策を批判したということだった。その後も私への検閲は厳しく、戦争非協力者と極印をうたれた。<sup>16</sup>）

這段戰後回顧性的文字，或許可以顯現出身處殖民地的女性作家，雖然能掌握人物內心細膩的刻劃，或對殖民政策以委婉的態度提出批評，但在戰爭時期發

<sup>16</sup> 〈坂口禊子作品解説〉，見中島利郎、河原功前引書，頁 562。

表的作品，要能達到以極客觀純粹的態度創作的境地，仍有個人或大環境的限制存在，而這也正是坂口禊子小說人物面對認同問題時，所無法突破大環境與時代制約的現實。

